

藏书家徐维则事迹钩述

钱 斌 宋培基

文献学家郑伟章先生曾著文,阐发蔡元培与徐友兰及铸学斋的关系,纠正了长期以来误以为蔡元培在徐友兰长兄徐树兰古越藏书楼校书一说^①。但在提及徐友兰之子徐维则时,郑说:“民国间采写的《绍兴县志资料》无传,其生平事迹无由知之。”^②直到 1999 年出版《文献家通考》,仍对徐维则语焉不详。徐树兰、徐显畋与徐友兰、徐维则两对藏书家父子,是蔡元培早年在绍兴交往最多的几位友人,其中以徐维则与蔡元培的关系最为密切。本文就其生平事迹及其与蔡元培的交往经历等作一述略。

一、徐维则收藏、传播书籍的活动

徐维则(1866-1922)^③,字仲咫,号以懋(又写作以孙、貽孙),以号行,会稽人(今绍兴)。自幼笃学好古,其学问渊博,治金石目录诸学及碑帖、古玩等,收藏颇丰。著有《东西学书录》、《石墨庵碎锦》、《述史楼书目》和《先考培之府君年之谱》等。徐友兰 1890 年到外地从事工商活动后,徐维则承继其父在绍兴的藏书、刻书事业。

徐维则的藏书书目主要有三:一是《述史楼书目》一册,稿本,蓝格,11 行,书口下方印有“铸学斋”三字,著录经史子集四部书共 2000 余种。二是《述史楼藏书别录》一册,钞本,为徐氏清点藏书之簿。三是《述史楼语古录》一册,稿本,著录皆述史楼收藏古物金器。最佳为“精本书目”近百种,其中旧钞本多达 60 余种,为徐氏藏书中之上品,其余皆为卷子、金石、碑刻、书画之列。各藏书目录均由徐维则手辑而成,藏书题记之类文字亦多出自其手。从藏书目录看,省志占三而浙江居首;府县诸志也以浙江为多,广东次之;另有相当的历史书籍。

徐维则收藏的金石拓片珍品颇多,有专门收藏室名曰“石墨庵”。据《麻横日记》记载,徐维则与藏书家、金石大家周星诒(字季貺,1833-1904)素有往来。周星诒在戊戌(1898)三月二十日追记六年前往事:“壬辰岁,在绍兴郡城

①郑伟章:《徐友兰铸学斋藏书及其与蔡元培之关系》,《文献》1988 年,第 4 期,第 189 页。

②郑伟章:《徐友兰铸学斋刻书考》,参见《书林丛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59 页。

③裘士雄:《鲁海拾贝》,大连出版社,2000 年,第 242 页。

有居水澄城巷徐怡孙孝廉(惟则),以旧拓隶碑一本示属审定,予遍考金石诸书,乃《汉华亭碑》也。自洪氏《隶释》著录后,遂不见诸簿录,臆当亡于宋元之间。”周经过认真考证,最后“推为天下罕见孤本”^①。谭献(1832-1901,字仲修,号复堂)《复堂日记》记有徐维则持周季貺函来访一事,徐赠其《禹陵空石题字》拓片等,谭献评徐为“浙东后起劬学之士”^②。据《苏甘室日记》记载,1896年正月十九日,徐维则请人到金石大家何澂之子何寿章处“拓家藏金石”;廿三日,徐维则赠送何寿章拓好的“金石拓本数纸”。二月十九日,何寿章又“为貺孙检古泉”^③。鲁迅在1918年6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题为《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说:“吕超墓志石,于民国六年出山阴兰上乡。余从陈君古遗得打本一枚,以漫患难读,久置篋中。明年,徐以孙先生至京师,又与一本,因得校写。”^④可见鲁迅的学术论文,得益于徐维则提供的拓片。在《鲁迅全集》中,鲁迅与徐维则的交往还有以下记载:1918年6月2日,“午后得徐以孙信并《吕超墓志》拓片一枚,及家藏金石小品拓片二十一枚”;3日,“上午得徐以孙信并转寄顾鼎梅所赠残石拓片九枚”;5日,“上午赠徐以孙《库汗安洛造象》、《翟煞鬼记》拓本各一枚,二弟持去”;26日,“以孙先生介绍拓版专函二封”;8月14日,“寄徐以孙先生信并专拓片一束,‘龟鹤齐寿’泉、吕超墓竟拓各一枚”^⑤。徐维则于1918年初到北大工作,他们的交往集中在6月至8月,而且多数与拓片收集、研究相关。

与许多藏书家一样,徐维则也喜欢钞书。《述史楼书目》著录铸学斋、述史楼钞本近20种。今仍可考见的如国图藏《璞岩诗集》一卷,钞本,有“徐维则所得善本”印。浙江图书馆藏《章氏遗书》二十册,书口有“会稽徐氏铸学斋藏本”九字,每册封面盖有不同的藏书小印,如徐维则印、石墨庵、徐维则学、以懋学篆、以懋学抄、会稽徐氏、述史楼藏、仲识等,每册后有“会稽徐氏铸学斋藏书印”。从封面“民国四年藏”长方朱印可知,徐维则1915年还在钞书并收藏。所藏钞本散出后,向为藏书家珍爱。

徐氏藏书“注重版本,尤以收藏旧抄本、原刻本、稿本为著名”^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所藏图书不下十万卷,为清末绍兴藏书大家。其藏书于徐友兰逝世前后(1905)开始散出。相当部分藏书通过蔡元培介绍流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序称:“会稽徐氏镕经铸史斋之书将散,徐氏故子民居停主人,乞其介归吾馆,旋以数十椟至,书固不恶,然所需者则犹未备

①周星治:《麻横日记》,参见《近世学人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②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③何豫才:《苏甘室日记》(光绪六年至二十八年),不分卷共27册,稿本,浙江图书馆藏。

④周树人:《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续),《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25日,第4版。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332页。

⑥郑伟章:《绍兴徐氏兄弟藏书考》,参见虞浩旭主编:《天一阁文丛》(第三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也。”^①当时徐树兰在绍兴建古越藏书楼已向公众开放,受西方现代公共图书馆理念及徐树兰影响,徐维则父子以为此批藏书入涵芬楼是最好归宿,万没想到会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本人的战火。部分流入藏书家外祖父沈映铃后人沈知方的粹芬阁,如现藏浙图之《周给谏文》,即为会稽徐氏铸学斋抄本,红格朱字,十行,每行24字,书中首页依次盖有“徐氏维则仲选”(朱长方)、“粹芬阁”(朱方)藏书印。沈知方在《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自序中说:“搜罗所得,计先后收进秀水王氏信芳阁,会稽徐氏铸学斋诸藏”,“而徐氏铸学斋旧藏钞本,尤为精绝”^②。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张元济得书可能是徐氏藏书中的中品;从徐维则1915年还钞书并收藏表明其钞本还在;从沈知方自序中,流露出其所得为徐氏藏书中的精品。据记载,沈知方是在抗战前先后收进铸学斋藏书的^③,说明徐维则的藏书精品是在其逝世后由家人散出。另有部分藏书流落民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人向徐氏后人收购古籍,至今在拍卖行也能见到铃有“徐维则读书记”的藏本。

徐维则对目录学颇有研究。1899年3月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出版,该书以新出的译书及日本人著作辑成,由蔡元培、马用锡、何寿章等人校正,足显铸学斋青年学子新学之修养。该书目计四卷,附录二卷,其主要成就:一是超越了四部旧制,用科学分类体系来类分图书。该书将哲学(理学)类单独列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目已成雏型,并在大类目下排列了若干子类目^④,比梁启超的“学、政、教”三大类目更为科学。二是除著录译者外,还著录原著作者。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识》中指出,当时中国“通行西书目,但标译人,不标撰人。西国立一议,创一法,勒为书,即以其名名之。中译之本,乃立书名,题撰人,作者之功,岂堪湮没,今概为著之。”^⑤同时,作者与译者凡外国人姓名前都冠以国别。三是增设类目,修改类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列有算学、电学等27大类,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增加了交涉、理学、幼学、宗教等类目,扩大到31大类。类目改名的有:学制改学校(学校类下又分出学制、教育、教授等子目)、西人议论之书改议论,无可归类之书改杂著等。四是撰有内容提要,对每种书的版本及优缺点一一介绍,并与相同类书有一比较。如在介绍英国的《妇婴新说》时说“西医于外症尤擅长,其治难产必能补中医所不及”^⑥。

①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序,《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3页。

②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自序》,林夕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36,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页。

③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④李亚舒,黎难秋等著:《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

⑤⑥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增版东西学书录》,参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9页、第244页。

徐维则所作识语,重点突出,博采众长,广受学界好评。《东西学书录》共收书537种,其中自然科学387种,社会科学126种,报章21种。两年后徐维则与顾燮光(字鼎梅)又补阙三百余种,1902年10月出版增订本。著名史学家陈旭麓评价该书是十九世纪“中国所译西书最全的目录”^①。蔡元培1899年1月14日记载,“以悉以《东西学书录》见示,属为订补”;1901年9月20日“以顾君所辑《续东西学书录》乞检定,并为作序”^②。蔡元培两次为《东西学书录》做校正,在其出版之际又为之作序。

徐维则还经营绍兴百年老店墨润堂。墨润堂由徐友兰创办于同治元年(1862),后徐友兰外出经商由徐维则主营,店名为蔡元培题写。《浙江藏书史》云:“徐维则于清同治元年(1862)在绍兴城区西营开设墨润堂书庄。”^③这显然有误,1862年徐维则尚未出生,他是在成人后接管墨润堂的。墨润堂不但自设作坊,自行校刻各种图书,而且还采购、销售本埠及外地新书,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开明等书店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且可根据读者需求,送书上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中著录的相当部分书目就是由墨润堂经销以及他自己所收藏的图书。

墨润堂还代售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徐维则为童亦韩、胡钟生办报之事几次写信向《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求教,在通信中写道:“鄙意以为报馆与学堂相辅而行,无学堂何以资培养?无报馆何以广见闻?东西各国报馆之多,几与学堂相埒,各立主义,不相复重,君民上下咸取资焉。近来中西学堂直省均已设立,不可不各设报馆以佐之。”他还认为“广设报馆,多译外报,总于风气有益,不敢以为不然。”^④正因为徐维则接受了新学,所以他不但支持朋友办报,而且墨润堂很早就发行《经世报》、《杭州白话报》^⑤等新学报刊。

鲁迅在绍兴期间,常到墨润堂买书。其离乡赴京工作后,每次回绍兴,都要光顾墨润堂。1913年7月5日,鲁迅“又在墨润堂买仿古《西厢十则》一部十本,四元八角”;1916年12月8日,“至墨润堂买玉烟堂本《山海经》二册,《中州金石记》二册,《汉西域传补注》一册,共直三元”。墨润堂还特派人上门推荐图书。1913年6月30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书贾王晴阳(墨润堂店员,作者注)来,持有《质园集》一部,未买”;翌日,“书贾王晴阳来,持有童二如《画梅歌》诸家评本一部,共三册,有二如自题面,未买”^⑥。

蔡元培也经常到墨润堂购书或看书,1898年11月1日记载,“到墨润堂,

①陈旭麓:《中国近代学论略》,参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②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9、361-362页。文中引用蔡元培日记均为农历,不再注明。

③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下),杭州出版社,2006年,第533-534页。

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18-1519页。

⑤参见1897年9月《经世报》第4期,第1页,1901年7月《杭州白话报》第2期,末页。

⑥《鲁迅全集》(第15卷),2005年,第72、252、70、71页。

买叶氏天文、地理、植物三歌略,《西学启蒙》十六种,体操书一种”;1899年1月26日,“日昃到墨润堂阅书,遂至学堂”。1900年闰八月十三日,蔡元培在嵯县剡山书院时,“墨润堂寄来《英文初范》等书”^①。从墨润堂经营品种看,其除了保存古籍以外,还以传播新学为己任。

作为藏书家,徐维则做的另外一件与藏书有关的事,是与蔡元培一起促成李慈铭藏书入藏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在1920年11月《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中,蔡元培提及此事:“去年,徐君以恐来北京,携越缦堂藏书目录,言其家将以藏书出售。”^②徐维则得知李慈铭后人要把藏书出售,即邀李慈铭族人李钟骏一起,将其全部藏书清点整理,并手录《越缦堂书目》一份。徐到北京后,马上把李慈铭家人要出售藏书一事告诉蔡元培,并把书目交其过目。蔡元培早年在李家课子,对李慈铭藏书非常熟悉,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系国立北平图书馆,请其设法收购李氏藏书。几经周折,终于在民国十七年将李慈铭藏书全部北运,悉数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二、徐维则与蔡元培的交往

光绪十二年至十七年(1886-1891),蔡元培由叔父蔡铭恩和田宝祺介绍,为徐维则伴读,同时在铸学斋校书。蔡由此饱读铸学斋藏书,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光绪十五年八月,蔡元培与徐维则同赴省城应乡试,两人同榜中举。翌年春天又同赴京应会试,蔡高中进士,徐落第,夏天两人仍一同出京返里。直到1892年初到北京补应殿试、朝考,蔡才离开铸学斋。

蔡元培伴读徐维则六年,读书兴趣相投。受乡贤章学诚的影响,两人治学都偏于史志。蔡元培22岁被聘为《上虞县志》总纂时,独自拟定《〈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在北京大学时,亲自起草《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简章》;在铸学斋时就曾设想编《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书。1894年蔡元培还“忆五年前馆以恐家,尝相约为《南北史》注,迄今无成议”^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设法由北大接管国史馆,即请徐维则到编纂处工作。至1918年6月徐维则编成《三国大事记初稿》,约一册,尚未缮写^④。蔡元培曾回忆:“我在二十馀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⑤。五四以后,国史馆被北洋政府收回,徐又回到绍兴,两人共同编纂史书终未成愿。

作为读书人,蔡元培和徐维则有很频繁的书籍往来。蔡元培日记中多处提到其部分藏书由徐维则赠送,如,“得以恐书,并贻我黄元同先生《礼书通

①《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192、210、270页。

②《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51页。

③《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7页。

④《纂辑员编成稿本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24日,第3版。

⑤《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86页。

诂》”；“昨以瑟送《梦影缘》十部”；“得以瑟帖，贻我陈九岩先生《囊翠楼诗稿》及梁卓如《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以瑟贻我《刘子全书遗编》、《述史楼丛书》”；“以瑟来，贻我石印《东西学书录》一部”。蔡元培也托徐维则购买书籍，如，“致以瑟书时，当属购《水窗春吃》”。徐维则购进好书时亦与蔡元培共同分享，如，“夜与钟生同访以瑟，见所买抄本胡頔君《汉西京博士考》及《河州景忠录》”；“同朗轩看以瑟，见抄本邵南江《旧五代史考异》三册”。徐维则还向蔡元培推荐一些新书，“得以瑟书，言《湘学报》中有《史氏新学纪闻》，亦斯宾塞尔所作，余未之见也”。蔡元培常向徐维则借阅图书，“致以瑟简，还《英字指南》”；“以瑟许假得华若汀《算学丛存》”；“以瑟见假《实斋文略》五册”；“以瑟许借得《翼教丛编》三册”^①。

蔡元培与徐维则年龄相仿，习性相近，两人亲如兄弟。1896年2月30日蔡元培“同闾仙看以瑟，谈竟夕。”有时两人谈得晚了，蔡就睡在徐家。1896年6月8日，“同以瑟、秋田看莼夫，晚宿于徐氏”；16日，“看秋农、伯棠，宿于徐氏”。1901年至1906年蔡元培的活动中心从绍兴转到上海，徐维则也多次来上海。蔡元培日记记载，1901年8月12日，“以瑟来，同往四马路，显敞邀饮一品香”；12月16日，“晚邀楚荪、以瑟、渭清饮于九华楼”；1902年2月14日，“邀以瑟饭于金隆。午后与补巨茗于同芳，亦韩、以瑟亦至。”2月16日，徐维则将奔赴江西就任，他们也是在上海话别。“以瑟夜登舟，将以知县需次江西，欢送之”^②。蔡元培长北大半年后接到徐维则来信，因其小女将要出嫁，信中“求鹤顾夫人绘小堂房画一幅，作宛蓼三女奁品，并欲求鹤顾加以题咏”^③，可见二人关系之密。

徐维则与蔡元培还同为家乡建设出力。一是办学。徐维则支持蔡元培、徐锡麟办学。1898年底至1900年初蔡元培在绍郡中西学堂任校长，徐维则虽不是该校教员，但也参与其中。1899年5月5日蔡元培“午后，约以瑟、莼渔、朗轩至学堂，与秋帆、莼渔商东文教习合同草。”10月5日，“夜以学生有赴试者，与以瑟、秋帆等往送。”^④1905年浙江光复会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大通学堂时，本想借用徐锡麟家寺，其父徐鸣凤得知后不许方丈把房屋借给其子，徐锡麟办学受阻。此事很快被徐维则知悉，便主动找到徐锡麟，表示愿借豫仓的空屋作为他们办学场所，大通学堂才得以9月份正式开学。陈魏在《光复前期的活动片断》中说徐维则把豫仓空屋借予徐锡麟是想从中得到提倡学务的好评^⑤。从

①《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3、72、99、177、221、35、219、96、194、75、79、197、214页。

②《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71、79、81、356、373、389页。

③《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36页。

④《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21、236页。

⑤陈魏：《光复前期的活动片断》，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28页。

徐维则一贯热衷办学和与徐锡麟的交往看^①,这种评价似欠允当。

徐维则办学也得到蔡元培支持。1900年12月11日,蔡元培为“以愚请改普济庵为北乡义塾事。去访熊太守,不晤,投以一函。”^②据何寿章《苏甘室日记》壬寅(1902)九月廿九日记载,“山佳叔辈偕鹤庐、秋凡拟在越郡设公学,来就余商,约共料理。”越郡公学议于1902年,蔡元培也参与了这一活动。1903年初,徐维则、何寿章等人在绍兴开始筹建越郡公学,何寿章到上海求助蔡元培以前,正月十四日,“两至徐貽孙处商公学及养新书藏事”^③。为支持徐维则他们办学,二月初十,蔡元培召集绍兴旅沪人士集会,组织了“绍兴教育会”,发表《绍兴教育会之关系》的演说,三月初一又在上海浙绍公所召开第一次月会,通过绍兴教育会章程、教育法程及事务所规则^④。二月廿七日蔡元培在致陶澐宣函中提及:“绍兴公学得文提倡,必增势力。上海亦竭力设法,大约不致成画饼也。”^⑤在上海和绍兴两地努力下,1903年九月初九,“是日公学集议于徐貽孙处”^⑥,徐维则、何寿章、杜海生等人商议越郡公学开学事项。

二是办蚕学会。1898年杭州知府林启在杭建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蚕桑专科学校——蚕学馆,蔡元培在绍期间常去蚕学馆并受其影响,希望改进技术,发展绍兴养蚕业,于是组织蚕学会。1899年10月4日,蔡元培“晤以愚,同访徐七先生,以得府局棉花捐札示也”;1900年12月11日,“蚕学馆学生吴、陈、俞三君来”;1901年1月23日,蔡元培“邀张大使议蚕学分会事”;24日,蔡元培“缮蚕学分会禀府稿”;2月6日,“为北乡进蚕学分会禀,亦韩赴杭州”;9日,“以愚来,则往炭业公所”;10日,蔡元培同徐维则等人往栖凫,“晤叔楠、纪堂、游后庵桑园,议定蚕学分会章程,并与慕庄订合同为分会教习”;3月3日,蔡元培“与章、薛二君至蚕学馆,晤车眉子。雨,留宿”^⑦。以上资料说明蔡元培、徐维则等人在绍兴所办蚕学会与杭州的蚕学馆是有关联的。

三、徐维则与地方文献

徐维则对地方文献辑纂也多有贡献。

据李致忠先生介绍,1983年出版的《析津志辑佚》一书,主要来源于四种书,其中之一即为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徐维则铸学斋藏本《宪台通纪》。徐所藏《宪台通纪》抄本,原是由山阴李宏信(字柯溪)小李山房的插架之物。后又归同

①徐维则与徐锡麟交往始于何时待考,墨润堂1901年刻印的《元代合参》由徐锡麟编次而删定,并为之作序。

②《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87页。

③何豫才:《苏甘室日记》。

④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7页。

⑤《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3页。

⑥何豫才:《苏甘室日记》。

⑦《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36、287、317、325、331页。

邑孙沂所藏,最后转归徐氏铸学斋,徐氏得书又钤“述史楼”、“维则所得善本”藏书印。李宏信在收藏后,曾亲笔题签,名曰《宪台通纪》。徐收藏《宪台通纪》后,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并撰写跋文分析道:“是书见存古迹、岁纪、祠祀、析津、风俗、学校诸门,又有朝仪、祭祀、迎驾、岁仪、架回、輿地诸类,见于注中。皆非通纪所应收之事。且学校门中有今改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之语,岂有元人之书而载明事?其非《宪台通纪》可知。殆柯溪先生因载有通纪序文,而偶题之欤?观本书体例,似系明初人辑元都掌故之书,故《永乐大典》中得而收之。书内有签校大典数条。惜首尾不完,学业媿陋,无能定其为何书。仍依旧题曰《宪台通纪》,以俟后人考定焉。”跋文不但记录了该书的承传过程,而且对书的内容、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指出此书非《宪台通纪》的理由为其记有明代洪武三年事迹,不是元人所作,应为明初人辑成。正如李致忠所言:“徐氏跋语中的推断颇具卓识,其非《宪台通纪》,可确信无疑。”^①徐维则对文献研究可见一斑。

徐维则对绍兴地方文献编纂主要作了三件事。一是编写《绍兴县修志采访事例》。绍兴修志采访处由绍兴县知事宋承家(逊庵)报请省府同意,经过一个月筹备,于1917年9月1日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城内仓桥下,主任徐维则,协理王世裕(字子馥)^②。徐维则当选修志采访处主任可谓当之无愧,由于对史志的爱好,他对家乡的修志事业一直有所用心。据《苏甘室日记》记载,农历1897年3月徐维则就与何寿章谈论“拟修会稽县志凡例”^③思路,至10月完成《拟重修会稽县志凡例》一文,刊登在第八、九期的《经世报》上。徐维则一上任,立即着手编写印行了《绍兴县修志采访事例》。据鲁迅日记记载,1918年2月5日,“上午得绍兴修志采访处信”^④,信的内容主要是征询其对纂修绍兴县志的意见。裘士雄在《黄寿衮和他创办的绍兴同仁学堂》^⑤一文中认为,《绍兴县修志采访事例》为黄寿衮亲手拟订。黄寿衮(1860—1918,字补臣)与徐维则、蔡元培同为乙丑同年。查阅《黄补臣太史年略》有记载:“时局变诡,杜门养疴,以绍兴兼辖山阴、会稽两县,旧志自康熙嘉庆以来岁久不修,文献沿革,深虑废坠,因从臬宋知事承家发起纂述,为作通启以告全属,并先设采访处于城区,议民国八年一月开局。”^⑥从以上记载可知《绍兴县修志采访事例》中以知事宋承家名义写的《编辑绍兴县志通启》,为黄补臣代写,而《绍兴县修志采访处成立报告书》、《绍兴县修志采访处拟订采访类目》等均为徐维则亲自拟草。绍兴县修志一事也因徐维则去北大工作为之中断。至于由王世裕等人发起成立绍兴县

①李致忠:《析津志与析津志辑佚》,《肩朴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

②徐维则:《绍兴县修志采访处成立报告书》,《绍兴县修志采访事例》,绍兴印刷局民国间排印本,第5页。

③何豫才:《苏甘室日记》。

④《鲁迅全集》(第15卷),2005年,第318页。

⑤裘士雄:《文史掇拾》,中华书局,2001年,第12页。

⑥《黄补臣太史年略》,绍兴图书馆藏。

修志委员会,则在1932年了,但其采访类目基本沿用徐维则所定体例。

二是参与《越中文献辑存书》编纂工作。清宣统二年(1910)九月至三年九月,王世裕等人主办的《绍兴公报》连载《越中文献辑存书》,同时刊行的铅印本由徐维则题签。《越中文献辑存书》第一辑共六册,十种子目分别为山阴何寿章(豫才)《苏甘室读说文小识》、会稽章正宸《偶东饿夫传》、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钞》、山阴田易《乡谈》、会稽姚启圣《忧庵大司马并夫人合传》、会稽陶及申《筠庵文选》、王绩铭《石家池王氏谱录》、山阴周铭鼎《柯山小志》(卷上)、山阴祁彪佳《越中园亭记》、会稽余煌《余忠节公遗文》。从内容看均为山阴、会稽二邑地方文献,由绍兴公报社编辑出版,无个人责任者,疑为徐维则所辑。清代绍兴府萧山人王绍兰辑《越中文献辑录》(稿本),徐维则曾认真阅读并为该书作补辑附录于书后,《绍兴县志资料》收录了徐维则的《会稽郡吴郡分治考》^①一文,注明出处为徐维则补辑的《〈越中文献辑录〉附录》。蔡元培曾在日记中写道:“以悉甚留意桑梓文献,凡乡先正见二十四史者,无论专传、附传,并次第写出,凡六巨册。近又欲取严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及《全唐文》中文字涉越故者,写出之。”^②王世裕对乡邦文献也颇有兴趣,与徐维则又熟悉,编辑《越中文献辑存书》自然会想到徐维则。蔡元培还说“以悉新得抄本,《称东饿夫传》,借读一过,会稽章格庵先生(正宸)著,实自编年谱也。”^③此手抄本收藏者甚少。山阴田易撰《乡谈》,未刊本,仅见于徐维则辑稿本《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这两种书《越中文献辑存书》均已收录。

《越中文献辑存书》中的《越缦堂日记钞》是最早问世的李慈铭日记,汇聚于铸学斋一批才子如蔡铭恩(蔡元培六叔)、马用锡、薛炳等人对李慈铭都非常崇拜,常读其诗文与尺牍,传抄其日记。蔡元培从1894年入住李慈铭家为其课子,阅读其日记十分便利,1894年8月10日蔡日记有“阅越缦先生乙卯、丙辰日记”。12日,“阅越缦堂戊午日记”。李慈铭逝世后,1897年2月17日,蔡元培“见沈子部比部,订分签越缦先生日记。”5月19日,蔡“始签越缦先生日记。”8月11日,“止轩先生送来越缦先生《荀学斋日记》十册。”1898年2月1日,蔡才“签《越缦堂日记》毕。”直到1899年2月14日,蔡元培“以《越缦堂日记》六十三册还承侯”^④。李慈铭日记在蔡手中存放两年之久,蔡与徐又经常互通,徐维则自然会摘抄《越缦堂日记》,1894辑录的《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中就有《越缦笔记》(不分卷)。由此分析以上所提的三种书只有徐维则最有条件提供。《越中文献辑存书》所收何寿章《苏甘室读说文小识》文后有徐维则一段识语:“右读说文小识一卷,为吾友何豫才司马所撰,胡钟生学

①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编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10册),1937年,第3-4页。

②《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96页。

③《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80页。

④《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0、31、118、132、141、174、212页。

博从其《苏甘室日记》中录出为之疏比,逐定是名。其远按古名,近证方言,足以补茹之樵先生越言释学,杜尺庄先生越言释疏证之未备。何君秉性敏颖,博学多能,甲午以后尤致力于算化诸学,曩年予与君居衡宇,想望,朝夕商榷,所获良多。”^①《越中文献辑存书》收入的十种文献至少有四种与徐维则有关,而且从为丛书题签到版本来源到最后题写识语,都说明徐维则参与了《越中文献辑存书》编纂工作。

三是校对《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徐氏父子刻书中有大量绍兴地方文献,如《绍兴先正遗书》,即为一部收集绍兴先哲遗著的丛书。在《会稽徐氏铸学斋丛书》中有陈锦撰《越中观感录》,书后附录《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录并记》,可知徐维则对此书关注已久。光绪十四年(1888)张岱撰、陈锦订《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重刻本在民初已鲜有传世,王世裕有再刻此书的愿望,得悉徐维则对该书有所研究,请其校对。徐氏“博考史乘,别录为考异”^②,并以李慈铭手校本及平步青《群书斟识》对此书详细校勘,又附列陈昼卿刻本之异文于其后,详尽列举了李、平、陈三本之异同。

作者工作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地方文献研究室

①绍兴公报社辑:《越中文献辑存书》,绍兴公报社,1911年,第7页。

②《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8页。